

 中国历史大讲堂

# 明史十二讲

赵毅 于宝航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历史大讲堂

【中国历史十二讲】

# 明史十二讲



赵毅 于宝航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十二讲 / 赵毅, 于宝航著. —北京: 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社, 2009.1

(中国历史大讲堂)

ISBN 978-7-5078-3025-5

I. 明… II. ①赵…②于… III. 中国—古代史—明代  
IV. K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0189号

## 明史十二讲

|             |   |
|-------------|---|
| 著 者         | 赵 毅 于宝航   |
| 责任编辑        | 凭 林   |
| 版式设计        | 国广设计室   |
| 责任校对        | 徐秀英   |
| 出版发行<br>社 址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br>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br>邮编: 100866 |
| 网 址         | www.chirp.com.cn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20×1020 1/16   |
| 字 数         | 230千字   |
| 印 张         | 17.75   |
| 印 数         | 5000册   |
| 版 次         | 2009年1月 北京第一版   |
| 印 次         | 2009年1月 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78-3025-5/K·152  |
| 定 价         | 32.00元  |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出版说明

泱泱华夏，悠悠岁月。六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提供了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的素材与智慧，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教训。

也正缘于此，在时代的当下，历史热持续升温，通俗化的历史读物、历史讲坛不断涌现，并受到社会的长久追捧。但细析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历史读物还是历史讲坛大多数都还只限于介绍史实、普及知识的层面，只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告诉人们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什么事，而缺乏对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集中阐述，即专题式的、纵向的深度论述明显缺乏。换句话说，市面上的读物、讲坛，基本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在讲“史”。历史是长时段的，需要从宏观上把握，单纯地讲故事，只能使读者、受众流于对史事的了解，却不能领会历史深处的奥妙，在无形中失去了真正触摸历史脉搏的机会。纲不举，目安能张?!

有鉴于此，我社于2007年开始陆续出版“中国历史大讲堂”系列丛书。在当年1月，涵括《夏商史话》、《西周史话》、《春秋史话》、《战国史话》、《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两晋南北朝史话》、《隋唐史话》、《五代史话》、《宋朝史话》、《元朝史话》、《明朝史话》、《清朝史话》等十三册的“历朝史话”系列顺利出版，并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读者的鼓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在“史话”系列的基础上，我社于2007年初又制定了出版“历朝十二讲”系列的计划，约请当今史学界最为活跃的专家学者，从各断代中，遴选出最为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十二个专题进行集

中讲解。

本套丛书作为“历朝史话”系列的姊妹篇，力求发扬其长处，弥补其不足。“历朝史话”强调的是内容全面，对各时段的历史进行综合系统的介绍，以使读者能总体性地把握；本套丛书则把重点放在讲解每个时段的特色问题上，希求引领读者走进历史的深处。

在编辑体例上，每个断代为一册，每册选取 12 个能够代表这一时段特色的大问题，进行细致入微、通俗深入的阐释，以使读者明了该时段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独特地位，改变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王朝的循环更替、皇帝家史的变化的习惯看法。因本丛书着眼于为大众传播历史，为他们提供把握每个断代的线索与框架，所以在夹叙夹议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严肃而不失活泼。

本套丛书包括：《先秦史十二讲》、《秦汉史十二讲》、《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唐史十二讲》、《宋史十二讲》、《金元史十二讲》、《明史十二讲》以及《清史十二讲》，共八册，将自 2009 年 1 月起陆续推出。

“横看成岭侧成峰”，天波浩渺的中华历史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亿万华夏儿女来说，不仅是一笔值得骄傲的精神遗产，更是深奥无比的智慧宝库，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有限的努力，唤起广大读者无限的理性和认知，不断地发现历史的真相，不断地接近历史的本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 目 录

|      |                        |     |
|------|------------------------|-----|
| 第一讲  | 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 .....       | 1   |
| 第二讲  | “靖难之役”后的明朝政局 .....     | 31  |
| 第三讲  | 七下西洋，扬天朝国威 .....       | 53  |
| 第四讲  | 土木之败与明中期政局的转变 .....    | 78  |
| 第五讲  | 差强人意的成弘治世 .....        | 97  |
| 第六讲  | 明武宗与“豹房政治” .....       | 120 |
| 第七讲  | “大礼议”与明代官僚队伍的大撕裂 ..... | 140 |
| 第八讲  | 王阳明与“左派王学” .....       | 165 |
| 第九讲  | 怠堕贪婪的万历皇帝 .....        | 185 |
| 第十讲  | 多灾多难的短命天子 .....        | 208 |
| 第十一讲 | 事事关心的东林党议 .....        | 231 |
| 第十二讲 | 有“道”无“福”的崇祯帝 .....     | 253 |

# 第一讲 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是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一阙《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朝末年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

元朝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到1368年灭亡，还不到百年，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大一统王朝相比，国祚是比较短的。这主要是由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忽必烈即位后曾推行了一系列“汉法”，奠定了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旧有的“草原本位”色彩并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在蒙语中仍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纪年方式汉、蒙并用，皇帝死后也同时有蒙、汉两种纪念性称号。如忽必烈按汉族传统的庙谥为“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国语”谥号则为“薛禅合罕”，意即贤明之汗。这表明元朝的皇帝实际上在一身兼任两种角色，既是汉族臣民的皇帝，同时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

坚持“草原本位”的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存在隔阂，缺乏长治久安之策。历史学家钱穆评价说：“蒙古恃其武力之优越……其来中国，特惊羨其民物财赋之殷阜，而并不重视其文治。……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

并不知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治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孟森先生也认为：“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当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爱民，亦有容纳士大夫一二见道之语，然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其实，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元朝统治集团不能完全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都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元朝最后一个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后为北元昭宗）曾经说过：“李先生（按：指其师傅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晓。”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儒化稍深，但他们同时也仍然是喇嘛教的虔诚信徒，且因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都未能有太大作为。大多数蒙古、色目贵族对儒学的态度亦与皇帝近似。

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昔日作为治国主导方针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而与儒学格格不入的保守势力直到元亡都相当强大。顺帝一度讲习经史，但左右近臣多加阻挠。帝师则对太子习儒提出异议：“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不仅皇帝多不习汉文，蒙古大臣中习汉文者也很少。如元朝后期的右丞相阿鲁图就对顺帝称“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向左转，成为笑柄。

从成宗即位到顺帝在位中期，元朝的统治大体上一直维持着稳定。但在稳定的表象之下，社会又始终孕育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各地的武装反元起事绵延不断，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武宗时，天灾人祸



交织，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山东、河南地区蝗旱交作，疾疫流行，百姓父子夫妇相卖求食。顺帝在位初期，权相伯颜把持朝政。此时元朝地方政局不稳的状况日益严重。频繁的地方动乱更加深了以伯颜为首的蒙古保守贵族对汉人的仇视情绪。在伯颜主持下，元廷重申汉、南、高丽人不得持有兵器的禁令，凡有马者皆拘入官，禁汉、南人不得习学蒙古文字，又专门要求朝中汉官讨论对汉族起事者如何镇压。据称，伯颜甚至向顺帝提出了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

这段时间内，自然灾害也很严重。黄河发生决口，河南、北大片州郡罹水患，土地荒芜，人烟绝迹。河患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威胁漕运和濒海盐场生产，直接影响到元朝财政收入。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发民工十五万、戍卒二万人治河。工程持续数月，至十一月完工，河归故道。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大河南北的百姓经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元廷在此时大举征发民工，督责严刻，死者枕藉，怨苦之声载道。民工成批聚集于工地，又为反抗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

至正十一年（1351）治河工程开工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趁机策划起义。他们加紧宣传白莲教“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的思想，并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治河工地上，同时散布谶语：“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河工挖出石人，递相传告，人心更加浮动。

这一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众于颍上，誓告天地，准备起事，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事未发而谋泄，被地方官捕杀。刘福通仓促起兵，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讲到：“起义的教徒都用红巾裹头，以区别于元朝的军队，当时人称之为红军、红巾或红巾军、香军；奉的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明教）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这两个神都是高鼻子，溜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了很稀奇，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指的是拜魔神，又叫作魔教。”

不过由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复杂性，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明朝》中认

为后来成为大明天子的朱元璋所参加的“这个革命团体的真正名称是什么，今已难考。在外表上，它只是半公开的一种宗教。有时候被称为‘明教’，有时候被称为‘白莲教’，有时候被称为‘弥勒教’。它的主要的口号是：弥勒佛下凡转世，作人间的‘明王’。它的主要的戒律与活动是烧香、点灯、吃素、做礼拜。”

起义军以“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文告鼓动百姓，又打出旗号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意在利用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号召、团结汉人，并直接提出了推翻元朝统治的政治目标。起事发动后，进展迅速，占领了黄、淮之间很多州郡，众至十万，屡败元军，百姓从之如流。其余地区亦纷纷起而响应，天下大乱。南方白莲教徒徐寿辉、邹普胜起兵于蕲水（今湖北浠水）并建立政权，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芝麻李据徐州，郭子兴据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亦皆以白莲教聚众号召。另外还有一些起事者不属白莲教系统，如活动于浙东沿海的方国珍和占据淮东的张士诚。其中张士诚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都于高邮（今属江苏），阻断漕运，对元朝威胁最大。

在各地反元浪潮的冲击下，元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江淮地区动荡的形势阻断了南方赋税的征收和北运，政府财政已无法支撑，大都一带的粮食供应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至正十八年（1358），大都发生饥荒，加之疫病流行，百姓大批死亡。十一座城门外各挖万人坑掩埋，所葬遗骸达二十万。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元顺帝却依然长期怠政，沉溺于游宴淫乐，亲自设计制造龙舟、宫漏等物品以备游戏，精巧冠绝一时。他又与一批近臣从西番喇嘛教僧人修习房中术，君臣宣淫，男女裸处，“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大臣张桢奏请“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宴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指出值大乱之际，“而陛下乃安焉处之，此所谓根本之祸也”。顺帝却执迷不悟，大元朝离灭亡不远了。

元末群雄逐鹿的最终获胜者是朱元璋。

朱元璋，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朱元璋的祖籍是江苏沛县，祖上几代都是种田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由

于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几经迁徙，到他父亲朱五四时已搬家到濠州。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又搬到西乡，最后搬到太平乡孤庄村。因为家贫，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朱元璋是唯一具有这种赤贫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他曾经说过：“世之寒微有能过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极也！”

朱元璋之为人，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他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正气与邪气兼具。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朱元璋的父亲，六十四岁的朱五四染病去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家破人亡。只有十七岁的朱元璋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在邻人的帮助下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扫地挑水一类的杂活。不久，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刚呆了五十多天，又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朱元璋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

晚年作了皇帝的朱元璋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道：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殓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莫何着裳。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

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踰，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佚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这段时间，朱元璋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坚强的毅力，但同时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至正七年（1347）底，朱元璋才回到寺里。此后，朱元璋能够从和尚成为开国君主，主要是由于能在人生和事业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抉择。第一个正确抉择就是投身农民起义。

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放过牛。汤和的邀请使朱元璋颇费思量，据说还在神前祈求指引。不过，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最终决定放下钵盂，“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去，这一抉择可谓顺应了历史大势。

朱元璋投身郭子兴部后，作战勇敢，“匹马单戈，日行百里”，而且“度量豁达，有智略”，才能出众。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不久，又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不过，朱元璋很快发现郭子兴暗弱，难以成就大业，“无足与共事”，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开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有政治、军事眼光。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国用献策说：“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

天下不足定也。”冯国用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这种战略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郭子兴命朱元璋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后，由于将士“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为此，朱元璋召集诸将，严肃军纪。他诫谕将士说：“诸将自滁来，多掳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悉皆还之。”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第二天即将所掳妇女全部放还。此后，朱元璋更加留意于军纪问题，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很得人心。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亳州建立了龙凤政权，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严明军纪以收民心，受龙凤纪年以韬光养晦，表明朱元璋不逞一时之能，志向高远。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南京）。攻占之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朱元璋自此开始把成为开国君主作为奋斗目标，自视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发布告示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毋横暴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

不久，他又对身边将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廩实，民人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朱元璋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

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的政权，处在几个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东北方是张士诚，西南方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为陈友定。这几个政权中，

张士诚财力雄厚，陈友谅兵力强盛，对朱元璋威胁最大。面对这样的形势，谋士刘基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掠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此后灭陈友谅，平张士诚，收降方国珍，掌握了南方大片土地。有了足够的军力、财力后，又开始谋划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在扫荡群雄期间，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于是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于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覆舟溺死小明王。翌年停用龙凤年号，改为吴元年。

对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视，专门召集谋臣将领讨论方略。最后，朱元璋提出了谨慎从事、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朱元璋为北伐中原制定了战略，并诫谕将士保持军纪，同时发布了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檄文中保证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对蒙古、色目人，也“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至此，北伐准备工作就绪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初二日，北伐大军克复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定国号为“大明”。

按照吴晗先生的观点，朱元璋定国号“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

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团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朱元璋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成为开国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少有。《明太祖实录》评价说：“传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然成汤革夏，乃资亳众；武王伐纣，爰赖西师。至于汉高，虽起徒步，尚藉亭长徒众所附。上不阶寸土一民，呼吸响应，以有天下，方册所载，未之有也。”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致力于国家的新建，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受后人重视与称道。

史载，顺治皇帝有一次与群臣议论政事，顺治皇帝问道：“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祖、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俱属贤君。”顺治又问：“此数君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并不赞同，说道：“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明太祖。即唐太宗并数君德政，皆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明太祖所定制度章程，规画周详，历代之君，实皆不及也。”认为朱元璋的制度建设最为完善。

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说道：“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酌古准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

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中书省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规定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任丞相的人更是仅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这种体制，在元朝的时候就造成了权臣专权的现象。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元朝皇帝不行常朝，每年仅在元旦、皇帝生日及某些大庆典时举行“朝贺”，平时并无接见百官的法定制度。因此“百官入见，岁不过宴贺一二日，非大臣近侍鲜得望清光者”。

此外，据学者张帆论述说：“由于元朝君臣关系中长期保持着来自草原游牧社会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份差异，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其权力在大多数时候都被看作皇权的外代和延伸，不被视为威胁。于是就出现了在汉族王朝乃至其他北方民族王朝中不常看到的情况：皇帝委任责成，大胆放权；大臣勇于任事，不加避忌。”

仁宗在位时，长期专权的右丞相铁木迭儿“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文宗在位时，燕铁木儿独为丞相，一切政务悉听总裁。此外还加给他太师、答剌罕（蒙古传统荣誉官号，有“得自由”、“自在”之意，可享受多种特权）的荣誉头衔，并封太平王。燕铁木儿“礼绝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娶泰定帝皇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达四十人之多。他的儿子唐其势甚至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燕铁木儿除兼任多项要职外，还亲统左、右钦察等若干支侍卫亲军，可谓如虎添翼。

顺帝在位前期，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权臣伯颜手中。元朝权臣专权的状况，在伯颜当权时期发展到了顶点。至元五年（1339），顺帝将伯颜的官衔改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辅，这在元朝是没有先例的。伯颜的兼职一再增加，累计头衔竟然达到二百四十六字。他“自领诸卫精兵……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薰灼，天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继伯颜当政的脱脱，与前任诸人相反，有贤相之称。但由于长期以来已形成了有利



于大臣专权的政治机制，故而脱脱也是“虽不弄权，而权自盛”。他任相时就国家的一些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举行过几次百官集议，实则最后全由脱脱一人做主，百官大都随声附和，持异议者均遭打击、贬黜。脱脱倒台后，仍然连续出现大臣专权的情况，直至元亡。

朱元璋即帝位后，深刻吸取元朝“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历史教训，但所承袭的政治体制又不可避免地使丞相权力过大，朱元璋逐渐感到皇权与相权的冲突，遂几次调整丞相人选，以加强皇权。

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出任右相国，他裁决如流，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左丞相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了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的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

朱元璋又问道：“杨宪何如？”刘基回答说：“宪有相材，无相器。”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愤辕破犁，祸且不浅。”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

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和李善长是同乡。因李善长的提携，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而且凭借与李善长的关系，在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大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